

流动性叙事研究

[专题导言]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流动”始终是一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核心命题。无论是身体在地理空间的迁徙,还是精神在文化疆域中的穿行,抑或社会阶层在历史变迁中的升降,流动构成了个体与集体存在的基本方式。20世纪中后期,西方学界相继提出“空间转向”“流动性转向”与“旅行转向”,这些理论思潮虽侧重点各异,却共同指向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意识:人、物、思想如何在时空中位移,以及这种位移如何塑造了人类的自我认知与文化记忆。而这一宏大的学术关怀,若追溯其精神源头,便不能不回到西方文学的摇篮——古希腊。

田俊武的研究揭示了古希腊神话与文学作为流动性叙事之母题原型的关键地位。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奥德修斯的十年漂泊不仅是一次地理意义上的旅程,更是一场关于身份确认与家园重构的精神跋涉。这位英雄在海上遭遇的种种考验,实质上构成了西方文学中“漂泊—归乡—自我认同”叙事范式的原初模型。而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中的创造性转化,则将这一范式进一步发展为“流亡—建邦”的史诗结构。从但丁的《神曲》到班扬的《天路历程》,从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到美国文学中的漫游传统,古希腊罗马的流动性叙事如同一股潜流,滋养着欧美文学的整体脉络。这一传统既塑造了英雄远征的壮阔叙事,也蕴含了孤儿流浪、身份流离的悲悯书写,成为西方文学想象世界与自我的基本语法。

如果说古典传统中的流动性主要体现为地理空间的跨越与归家的执念,那么进入现代性语境之后,流动的内涵则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胡强对伊舍伍德《诺里斯先生换火车》的分析,将流动性叙事的触角延伸至魏玛共和国晚期社会变迁的微观层面。诺里斯这位固守绅士外表的主人公,其内心的异化与沉沦正是流动性在历史转型期的极端呈现:消费欲望的膨胀、生存焦虑的弥散、战时记忆的幽灵般缠绕,共同瓦解了传统绅士价值观所承诺的稳定与确定感。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充满流动性的不确定感——身份的符号已然断裂,程式化的生活轨迹已被时代的洪流冲垮。诺里斯的“奢侈”不仅是个人道德的沦丧,更是一个时代在情感结构与历史感知上的症候性表达。伊舍伍德以一种“日常生活史”的视角,将历史大叙事与个人小生活编织在一起,使流动性不再仅仅是空间中的位移,更成为社会阶层、价值观念与集体记忆在时间中的震荡与重组。

将这两篇文章并置阅读,我们得以窥见流动性叙事在欧美文学传统中的连续性与变奏。从奥德修斯的海上漂泊到诺里斯的身份流离,流动既是人类存在的原初境遇,也是文学想象的不竭源泉。在古典时代,流动承载着英雄对家园的追寻与对命运的叩问;在现代性语境中,流动则折射出个体在历史裂变中的无所适从。古希腊神话与文学所奠定的叙事范式,历经千年的流转与变形,始终以其强大的原型力量为后世作家提供观照流动、书写流动的精神图式。流动从未停止,而文学对流动的书写亦将生生不息。

——田俊武

古希腊神话、文学中的流动性 叙事及其对欧美文学的影响

田俊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191)

摘要:在20世纪中后期,西方学界提出的“空间转向”“流动性转向”和“旅行转向”实则互相关联,共同指向身体、精神与物品在地理和社会空间中的位移。其中,“流动性”作为更为宏大的概念,不仅涵盖“旅行”,更凸显跨越疆域与文化边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英国旅行文学史”(22&ZD288)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英国旅行文学史”(22BWW05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田俊武,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三明学院海外学院“闽江学者”讲座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要从事英美文学、比较文学和旅行文学研究。

引用格式:田俊武. 古希腊神话、文学中的流动性叙事及其对欧美文学的影响[J]. 外国语文, 2026(4): 80-92.



本刊微信公众号

界的迁徙与转变。若追溯其源头,古希腊神话与文学便提供了最初的叙事范式。荷马史诗《奥德赛》以英雄漂泊、归乡与自我认同为核心,奠定了西方文学流动性叙事的基础,而维吉尔《埃涅阿斯纪》则在继承与转化中进一步确立了流亡与建邦的叙事模式。这些古典文本不仅塑造了欧洲文学中的旅行与流动性书写传统,如但丁的《神曲》、薄伽丘的《十日谈》、班扬的《天路历程》、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也深刻影响了美国文学的生成。美国文学中的英雄漫游与家园追寻可追溯至《埃涅阿斯纪》,而孤儿流浪与身份流离的叙事母题则可见于笛福的《摩尔·弗兰德斯》。由此,古希腊神话与文学中的流动性叙事不仅是西方文学传统的源泉,更成为欧美文学中旅行与流动性表现的重要原型。

关键词:流动性;旅行;古希腊罗马神话;欧美文学;文学发生学

中图分类号:I0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6)04-0080-13

DOI:10.26922/j.cnki.waiguoyuwen.2026.04.006

0 引言

西方学界关于“流动性”的研究可追溯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e Simmel)的经典论述。他通过对城市空间的观察,特别是道路、桥梁等承载旅行与交往的交通基础设施,发现人类在跨越空间、建立联系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在此基础上,齐美尔按照社会形式与空间特征,将流动性分为游牧、流浪、离散、迁徙、旅游、冒险等不同类型(Simmel,1997:160)。这一分类与20世纪后期人类学家关于“旅行”的类型划分高度契合,由此可见,“流动性”与“旅行”在研究对象与概念指涉上具有极强的重合性与互补性。进入21世纪,“流动性”成为社会学与文化研究的重要关键词。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在《流动的现代社会》(*Liquid Modernity*,2000)中借助“液体”(liquid)这一意象揭示现代性不稳定、漂移与加速的特征,而约翰·厄里(John Urry)则在《超越社会的社会学:21世纪的流动性》(*Sociology Beyond Societies: Mobiliti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2000)中使用“流动性”(mobility)的概念,强调空间移动和跨界交往在现代社会结构中的核心地位。虽然二者在术语选择上存在差异,但都将“流动性”视为现代性的鲜明标志。对于流动性的定义,他们大体上将其归纳为三层含义:“一是指移动或具有移动能力的物或人;二是指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流动性,即在阶级与社会地位方面的上下运动,是纵向移动;三是指迁徙和移民等半永久性的地理移动,是横向移动。”(Urry,2007:8)厄里对流动性的三重界定,既保留了与个体身体旅行的高度重合,又拓展了其内涵,使“流动”不再仅局限于人类的地理位移,而是涵盖人类、动物、物品、信息、资本、性别、阶级与文化等多重层面。然而,如果将“流动性”的文化根源进一步上溯,可以发现古希腊神话与文学早已为这一现代性概念奠定了叙事原型。无论是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奥德修斯十年漂泊与归乡的故事,还是维吉尔《埃涅阿斯纪》(*Aeneid*)对流亡与建邦主题的重塑,都展现了“身体移动—精神追寻—身份重建”的叙事结构。这些古典文本不仅为欧洲文学提供了流动性书写的源

泉,更在跨越大西洋后影响了美国文学的生成逻辑:英雄漫游与家园追寻的模式可追溯至《埃涅阿斯纪》,而孤儿流浪与身份漂泊的母题则在笛福《莫尔·弗兰德斯》中得到典型化,并延续至美国文学传统。因此,从齐美尔和厄里所提出的现代社会学“流动性”概念回望,可以更清晰地理解古希腊神话与文学在叙事层面上的奠基作用——它不仅是现代学术“流动性”研究的文化背景,更是欧美文学中旅行与流动性叙事的原初模型。

作为一种宏大的人类学行为与文化现象,流动性与旅行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始终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没有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社会结构便会陷入僵化,而这种僵化若长期持续,终将导致社会机体的衰亡;没有经济资本的流动性,生产与交换便会停滞,经济停滞的结果同样是社会的解体;没有意识与观念的流动性,人类思想便会陷入停滞,而思想的停滞最终也会导致社会走向死亡。由此可见,流动性不仅关乎地理空间的迁徙与移动,更是维系社会、经济与文化活力的内在机制。正如迈克尔·门晓(Michael Mewshaw)在探讨旅行意义时所强调的那样,人类之所以旅行,正是为了“欣赏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森所称之为的‘只为运动’的愉悦。因为不运动就意味着人生的最终事实——死亡。我们只有通过不断的运动并在旅途中与我们的旅行同伴相遇,才能证明我们还活着”(Mewshaw, 2005: 2)。这一论断不仅揭示了流动性的生存论维度,也折射出旅行叙事在文学传统中反复被强调的“以运动对抗死亡”的母题。在欧洲文学史中,歌德的《浮士德》便是这一母题的典型呈现。浮士德与魔鬼墨菲斯特达成的契约,意味着只要他保持持续不断的欲望追求,就能获得财富、权力与社会影响力;而一旦欲望与运动停止,他便将立即走向死亡。在故事的结尾,当浮士德试图定格于美的瞬间,说出那句著名的话——“停下来,你太美丽了”时,他随即陷入毁灭(Jensen, 2006: 336)。由此,歌德揭示了流动性、现代性与死亡之间的紧密关联:不断的运动与追寻才是生命与存在的真正证明。如果将这一逻辑向前追溯,我们会发现古希腊神话与文学早已奠定了“流动性与生死相连”的叙事原型。无论是《奥德赛》中奥德修斯在漂泊旅途中的生存挣扎与精神成长,还是《埃涅阿斯纪》中流亡者通过不断迁徙而完成的家园建构,这些古典叙事都表明:停滞意味着毁灭,而流动则孕育着新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古希腊神话与文学为后世欧洲乃至美国文学提供了“流动性即生命”的原初叙事框架,并深刻影响了现代性语境下文学与文化对流动性的哲学化阐释。

文学作为关于“人”的艺术表征,始终承载着对人类存在与经验的叙述,而“流动性”研究在文学中的切入点,首先便体现在对身体旅行叙事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两部重要批评著作,集中揭示了这一研究维度:玛丽·布拉特(Mary L. Pratt)的《帝国的眼睛:旅行写作和跨文化主义》(*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强调旅行写作在帝国语境中折射出的权力关系与文化互动;凯伦·凯普兰(Caren Kaplan)的《旅行问题:位移的后现代话语》(*Questions of Travel: Postmodern Discourses of Displacement*)则揭示了旅

行在后现代语境中所指涉的多重位移经验。这两部著作不仅为文学中的流动性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也凸显了旅行叙事与文化身份、空间转换之间的紧密联系。具体而言,文学中的流动性研究主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文学作品中人物的身体旅行与空间转化,以及这种旅行与转化对其生命轨迹和自我认同的深刻影响;(2)旅行载体与交通设施的革新如何反映人类现代性进程,以及这种进程对于流动性的持续推动;(3)文学作品中社会阶层、经济资本、意识观念等方面的流动与变迁,以及它们在阶级结构调整、生产方式更新和思想转型中的作用;(4)文学范式和传统在国家与民族间的跨文化流动与传播,由此引发的文学互动、影响与新型文学范式的生成,例如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旅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关于流动性的文学表现并非仅仅属于现代性的产物,而是早在古希腊、罗马神话与文学中便得到了充分体现,并深刻影响了后世欧美文学的叙事传统。这些古典文本所呈现的流动性叙事原型,为后来的欧洲文学,例如中世纪的宗教旅行叙事与启蒙时期的冒险小说奠定了基础,并在跨越大西洋之后,对美国文学的叙事母题与身份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本文将主要从“身体旅行”的视角出发,探讨流动性在古希腊与罗马神话和文学中的表征及其对后世欧美文学发展的发生学意义。

1 从漂泊到建邦:古希腊、罗马神话与文学的流动性叙事

尽管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等社会学家认为“社会流动性”主要是现代与后现代社会的本体特征,并指出在中古社会中由于受到官方与宗教的严厉抑制而几乎难以实现(Herlihy, 1973: 623),然而,进一步的研究却表明,流动性远非现代性的专属产物。事实上,早在古希腊时期,流动性作为一种社会与文化的基本现象,已经扎根于人类的集体实践之中。瑞内特·施莱塞尔(Renate Schlesier)和乌尔赖克·泽尔曼(Ulrike Zellmann)在《从远古到中世纪:地中海地区的流动性和旅行》(*Mobility and Travel in the Mediterranean from Antiquity to the Middle Ages*, 2004)序言中强调:“对于古希腊文化来说,流动性似乎是一个独特的特征。”(Schlesier et al., 2004: 7)这一论断并非抽象的概括,而是有切实的历史与考古依据。即便在人类文明尚处“童年”的时代,古希腊人已展现出高度的流动意识和实践能力。他们不仅敏锐地认识到交通工具在拓展流动性方面的决定性作用,还学会了制图,从而以视觉和空间的形式将旅行经验加以固定与传承。克里特文明时期,古希腊人便能够制造适于远航的高头低舷之船。至公元前1700年,三层桨战船已被制造出来,这不仅推动了商业交流与军事远征的拓展,也使海洋想象逐渐成为文学与神话叙事的核心母题之一。阿纳克西曼德(Anaximander, 公元前610—前545)更可能是古希腊第一位绘制地图的人。据说,在他的地图上,地中海被描绘为一个封闭的盆地,四周是无际的大海,环绕着人类居住的世界——这种空间想象与希腊神话中“圆形大海”的意象高度契合。然而,古希腊的

旅行并非浪漫无忧。尽管交通工具与道路设施的不断改进为流动性提供了物质保障,但旅行者出于商贸、探险、征战、朝圣、求学或娱乐等多重目的而踏上旅途,往往依旧充满危险。大卫·康斯坦丁(Constantine, 1984:6)指出:“希腊之行异常费力和危险。旅行者冒着在海上被海盗俘获和抢劫的危险,在陆地上被土匪抢劫的危险。还有瘟疫、土耳其人的骚扰和数以千计的偶然事件。”这种艰险的经验不仅构成了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也渗透进文学与神话叙事之中。从奥德修斯的漂泊归乡到阿尔戈英雄的冒险远航,古希腊文学不断将危险与流动性交织在一起,从而奠定了西方文学传统中旅行与流动性叙事的原型,并为后世欧美文学中的漂泊、冒险与迁徙主题提供了源头性的参照。

正因为如此,古希腊人在旅行时总会祈求神灵的庇护,这种宗教与文化观念深刻地影响了文学叙事。在古希腊神话中,许多神祇的职能与旅行密切相关。赫尔米斯(Hermes)——宙斯之子,负责交通、旅行、贸易和疆界,每当旅行者计划出行或遇到困难时,都会向他祈求帮助。太阳神阿波罗(Apollo)则驾驶太阳车,在旅途困境中为人类提供援助。在古罗马神话中,阿比奥娜(Abeona)和阿蒂奥娜(Adiona)是专司旅行的女神,前者守护旅途的启程,后者庇佑归途安全。在古希腊、罗马神话、英雄传说、史诗与悲剧作品中,神祇与英雄的旅行经历比比皆是,旅行与流动性因此成为文学叙事中极为突出的主题和情节动力。即便是尊贵的奥林匹斯诸神之首——宙斯,也经常化身为孤独旅者游历人间(Forder, 2014:33),显示了神性与旅行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旅行过程中的冒险与挑战,也体现了人物通过身体流动实现自我认同的文学机制。古希腊神话中,女神的流动性与旅行叙事同样丰富而复杂。不仅奥林匹斯山上的女神频繁流动,其他具备羽翼的女神也常常穿越天地空间。正如阿里亚德纳·康斯坦迪诺(Ariadne Konstantinou)所言:“不仅仅奥林匹斯山上的女神是流动性的,在希腊思想中其他有羽翼的女神们也经常流动。她们的羽翼似乎象征着她们有在空间流动的能力。”(Konstantinou, 2018:23)这些女神的流动不仅突破了家庭与地域的限制,还与性别身份及权力密切相关。例如,宙斯的妻子赫拉每年春天前往纳普利亚(Nauplia)的卡纳萨斯温泉沐浴以恢复贞操;谷神德墨忒耳(Demeter)离开奥林匹斯山,遍历凡间寻找被冥王掳走的女儿;爱神阿佛罗狄忒(Aphrodite)则穿行天地之间,追寻爱情与欲望。这些叙事不仅凸显了古希腊神话中旅行与流动性的文化意涵,也体现了流动性与性别、空间及身份的有机结合,为后世欧洲文学中漂泊、探索与身份建构的叙事模式奠定了典型原型。

然而,若论及神灵与英雄流动性叙事的经典呈现,最为著名的仍是古希腊史诗。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us Rhodius)的《阿尔戈英雄纪》(Argonautica)讲述了英雄伊阿宋(Jason)率领阿尔戈英雄们远征寻觅金羊毛的旅行与冒险经历,被誉为“古代最著名的旅行史诗”。这一史诗不仅展现了英雄的身体流动与远航冒险,更呈现了古希腊人对空间、地理与未知

世界的想象,从而奠定了文学中旅行叙事的典型模式。古罗马史诗中,维吉尔(Virgil)的《埃涅阿斯纪》同样强调旅行与流动性,叙述了特洛伊王子埃涅阿斯在特洛伊陷落后,率领残余王室成员跋涉至意大利并最终建立罗马的历程。史诗中的旅程与流动性不仅推动了叙事发展,也成为塑造英雄形象、描绘命运与国家起源的核心手段。通过这些旅行,英雄不仅完成地理的跨越,也完成心理、文化与政治身份的建构,为后世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叙事范式。然而,在所有古典史诗中,对后世欧美文学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荷马的《奥德赛》(*Odyssey*)。该史诗主要描写英雄奥德修斯(Odysseus)在特洛伊战争结束后,率领将士们历经艰险返回故乡,与家人团聚的过程。在长达十年的海上漂泊中,奥德修斯探索了无数未知海域:他遭遇斯库拉(Scylla)巨岩与卡瑞布迪斯(Charybdis)漩涡的险境,踏上塞壬(Sirens)居住的岛礁,冒险穿越冥河进入阴间,再从冥河归来,最终到达象征世界尽头的赫拉克勒斯之柱(Pillars of Heracles)。

荷马似乎有意识地通过延缓奥德修斯重新获得伊萨卡王位的过程来拖延其旅程终点的到来,这种叙事手法不仅增加了故事的张力,也凸显了旅途本身的意义。在这一层面上,奥德修斯的旅行不仅是身体和空间的移动,更是身份、认同与社会地位的再建构。在许多方面,荷马的《奥德赛》奠定了欧洲文学流动性或旅行叙事的基础,正如艾米莉·格林伍德(Emily Greenwood)所言:“自从它在公元前八世纪下半叶问世以来,荷马的《奥德赛》已经成为字面和隐喻上探险与旅行的象征。这部史诗沿着奥德修斯的漫游轨迹,叙述了他在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归途中探索文明世界物理与概念极限的经历。在某种意义上,这首诗发展了‘归家’或‘归航’的主题,因为奥德修斯试图返回他的家园伊萨卡。”(Greenwood, 2013: 880)可以说,《奥德赛》通过描绘旅程的延宕、危险与探索,不仅呈现了古希腊文学中流动性叙事的原型,也为后世欧洲史诗、浪漫冒险小说乃至美国文学中的漂泊、远行和身份认同主题提供了持久的范式。它所体现的旅行不仅是地理上的迁徙,更是文化、心理和社会维度的流动性实践,使文学中的旅行叙事兼具空间、时间与身份建构的多重意义。

2 古典神话与旅行叙事的流动性:欧洲文学发生学视角下的考察

“文学的发生学,即探明文学文本之所以形成现有面貌的内在成因。”(严绍璦,2003: 2)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文学发生学不仅关注文本本身的艺术结构,更强调文学作品生成的语境、源流及其变异过程。在西方文学的源头研究中,学界长期以来将其文化基础归因于所谓的“两希”文明,即希腊与希伯来文化的互动与交融。正如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所言:“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这两者之间的影响推动着我们的世界。在一个时期,感受到它们中的这一个吸引力大些,在另一个时期,又感到另一个的吸引力大些;虽说从来不曾,但却应当在它们之间保持适当和幸福的平衡。”(Arnold, 1960: 165)这一

论断强调了古希腊文化在形成欧洲文学传统中的核心作用,尤其是对于美学观念、叙事结构和流动性主题的奠基意义。然而,从地理与历史现实来看,古希腊位于欧洲东南部的巴尔干半岛,与欧洲大陆其他地区相隔甚远,与英伦三岛更是相距约两千六百公里。在远古时期,交通工具极为简陋,即便古希腊人本身热衷于流动与旅行,也很少有人能够踏足欧洲大陆的边远地区,更遑论到达现代的英国。迄今为止,已知最早的一位进行远洋旅行的古希腊人是地理学家兼探险家、天文学家皮西亚斯(Pytheas),他在大约公元前325年展开对欧洲西北部的探险,抵达现代的英国和爱尔兰地区。尽管他曾撰写过关于这些旅行经历的著作,但绝大部分文本未能保存至今,因此很难从直接证据上考察这些旅行对欧洲文学,尤其是英国旅行文学的早期影响。由此可见,尽管古希腊文学在思想、神话与叙事模式上对后世欧洲文学具有深远影响,但其实际的空间移动与地理接触却受到历史与技术条件的限制。这种局限性表明,文学的流动性与文化影响更多是通过叙事范式、神话主题和象征性想象传递,而非单纯依赖物理性的旅行经验。这也为理解古希腊神话与文学中的流动性叙事对欧美文学发生学的作用提供了重要视角。

古希腊、罗马文学对欧洲文学的直接影响,实质上是在地理大发现与文艺复兴时期才真正显现出来。在此期间,人文主义思想的复兴、哥伦布及其他探险家的航海壮举、地图绘制技术与印刷技术的普及,共同促进了欧洲社会在本土及全球范围的流动性。正如托马斯·阿斯泽乌斯基(Tomasz Arciszewski)所言:“文艺复兴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国家内部以及整个欧洲的流动性。同时它也是欧洲之外整个世界的地理大探险。”(Arciszewski, 2016: 18)事实上,文艺复兴自身也是流动性的产物。14世纪末,随着奥斯曼帝国对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的入侵,众多学者携带古希腊与罗马的艺术珍品及文学、历史、哲学书籍,逃往西欧避难。这种文献与思想的迁移与流动,为意大利及其他欧洲地区的学术与文化复兴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成为文艺复兴运动兴起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在这一背景下,古希腊、罗马文学中的流动性叙事逐渐通过学者与书籍的跨地域传播,进入欧洲文学创作的视野。因此,可以认为古希腊、罗马文学对欧洲文学的源头性影响,尤其是其流动性叙事的作用,主要在文艺复兴及其后期的欧洲文学作品中得以体现。从荷马史诗《奥德赛》到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古典文学所呈现的旅行与流动性主题,为后世欧洲文学提供了叙事范式和象征模型。评论家内尔·斯迈尔赛(Nel Smelser)对此评价道:

在《奥德赛》传统的影响下,史诗性旅行成为但丁的《神曲》、薄伽丘的《十日谈》、杰弗利·乔叟的《坎特贝雷故事集》、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奇境游记》、约拿旦·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亨利·菲尔丁的《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宝岛》以及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的《失去的地平线》的中心叙事结构

(Smelser, 2009:4)。

在但丁的史诗《神曲》中,诗人但丁在一天傍晚迷失在一片阴暗的森林中,象征性地陷入人生的迷途与道德困境。在这片幽暗之地,他冥冥中遇到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并在其引导下展开了一次穿越地狱、炼狱直至天堂的旅程。这段旅行本质上是一种精神与宗教的朝圣之旅,其叙事不仅描绘了空间上的移动,更强调了时间、道德和灵魂状态的流动性。正如威恩·雷布霍恩(Wayne A. Rebhorn)所言:“作为旅行者和朝圣者的这位诗人,将要从地狱穿过净界,直到最终来到天堂,站在上帝的对面。但丁有意识地将他的朝圣之旅置于他三十五岁的年纪,他的旅行因此发生在他人生的宗教临界点上,这个关键性的运动使其置于罪恶的过去和救赎的将来之间。”(Rebhorn, “Introduction”, 2013: xxiii)在这一意义上,流动性不仅体现在地理空间的穿越,更是人类精神与道德实践的象征。与此同时,乔叟的史诗《坎特伯雷故事集》通过20篇诗体故事的串联,将朝圣者前往宗教胜地坎特伯雷大教堂的旅程作为叙事框架,展现了中世纪晚期至文艺复兴早期英国社会中流动性的重要性,正如萨拉·赖特(Sara Wright)所言:“《坎特伯雷故事集》是乔叟所有作品中表现流动性最明显的一部,表现基督徒到坎特伯雷教堂的旅行。正如曼德维尔的《游记》一样,基督徒的旅行目的逐渐淡化成背景,充满流动性的世界成为叙述的主体。”(Wright, 2020:3)在这里,旅行本身不仅是宗教行为,更成为社会、文化和个体经验流动的舞台,展现了中世纪欧洲文学中流动性叙事的多维特征。通过比较《神曲》与《坎特伯雷故事集》,可以看到,流动性在欧洲文学中的表现形式既受宗教与精神意义的塑造,也融入社会生活和日常经验,从而形成文学叙事中贯穿始终的动态结构。这种流动性的文学表达为后世欧洲文学,甚至欧美文学中旅行与流动叙事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这些经典的文学范式中,小说尤其成为表现旅行与流动性叙事的理想载体。正如克里斯·埃沃斯(Chris Ewers)所指出的那样:“与时间性和空间性互动最为密切的小说,被证明是思考流动性效果最理想的形式。人生作为旅行的隐喻贯穿人类历史的始终……但这一隐喻在18世纪显得尤为突出,它强化了一种新兴的文学形式,这种形式在英国出现,当时人们开始享受流动性所带来的新鲜体验。”(Ewers, 2018:3)自18世纪小说作为欧洲,尤其是英国的一种独立文类确立以来,旅行与流动性叙事便成为其核心叙事框架之一。这不仅体现在小说的情节结构上,也深刻影响了人物塑造与主题呈现。埃沃斯进一步强调:“18世纪在英国兴起的小说形式,与流动性(mobility)紧密结合。旅行母题长期以来是散文叙事延续与发展的有机原则,许多文本被视为小说传统的先驱。例如,托马斯·纳什(Thomas Nashe)的《不幸的旅行者》(*The Unfortunate Traveller*, 1594)、埃弗拉·本(Aphra Behn)的《奥鲁诺克》(*Oroonoko*, 1688),以及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都清晰地展现了旅行与流动性的紧密联系。”(Ewers, 2018:1)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

流记》(1719)不仅确立了后世所谓“小说”散文叙事的形式,也使旅行叙事成为推动文本发展的重要结构工具。这种通过旅行与空间流动展开的叙事策略,不仅丰富了18世纪小说的表现手法,也为后续欧美文学中流动性叙事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3 从维吉尔、笛福到霍桑、马克·吐温——欧洲文学中的流动性对美国文学的发生学影响

笛福的小说在英国文学中以流动性叙事开创了小说形式,而对美国文学影响深远的则是《莫尔·弗兰德斯》(*Moll Flanders*)。虽然《鲁滨逊漂流记》一开始便将叙事焦点置于鲁滨逊的海上漂泊与冒险之中,通过逃离熟悉的家庭而选择一种流动与冒险的人生,但正是《莫尔·弗兰德斯》在文学史上奠定了旅行叙事与美国文化身份之间的紧密联系。“莫尔·弗兰德斯最终流落到美国,在那里欧洲旅行叙事的文学传统得到继承并具有新的特点。美国的诞生和青春期成长似乎就建立在旅行的概念之上,旅行也由此成为美国文化身份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特征。”(Laderman, 2010: 5)该小说所塑造的孤儿流浪、流动性和犯罪叙事模式,为美国文学提供了持续的叙事资源,尤其影响了19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

在19世纪美国文学中,弗兰德斯式流浪旅行的典型体现是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从流动性的视角来看,小说展现了白人自由与黑人受限的流动性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对族裔身份认同的深刻影响。哈克·芬的流动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拒绝社会流动性,不通过文明教育融入上层社会;二是追求身体的流动性,通过密西西比河的自由漂流拒斥虚伪文明的束缚,以保持内心的健全。而黑人吉姆的流动性则是摆脱种族奴役的关键手段,但在当时受到白人社会的限制,并伴随巨大风险。这种弗兰德斯式的孤儿流浪和流动性叙事在20世纪美国小说中表现得更为充分。代表作品包括塞林格(J. D. Salinger)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索尔·贝娄(Saul Bellow)的《奥吉·马奇历险记》以及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所罗门之歌》。尤其在表现女性孤儿的流动性方面,莫里森的派拉特(Pilate)与笛福的莫尔最为相似,但莫里森将旅行叙事与黑人问题紧密结合。父亲去世后,派拉特独自旅行寻找亲人,途经牧师住所与农场,却因拒绝性骚扰或被排斥而继续漂泊,最终在小岛上安顿并生育孩子。然而,她的流动性并未结束,地理书的启蒙促使她踏上20余年的流浪之旅。在旅途中,她因没有肚脐而被同族排斥,这份孤独唤醒了她的族群认同,使她决定返回家乡,与族人建立新的和谐关系。这种出走与回归的双向流动体现了流动性与身份认同、地理认知与社会归属之间的深刻联系。“作为莫里森绘制南方地图的一部分,派拉特的地理书非常重要,因为它代表着认识外部世界和本体性阅读。莫里森的派拉特身上所体现的地理流动性和自由暗示着帕特利夏·威廉斯(Particia J. Williams)在《开敞的房子》一书中所提出的流动性和现代性的关联。”(Davis, 2011: 44)

索尔·贝娄的《奥吉·马奇历险记》同样是20世纪美国文学中表现旅行与流动性叙事

的杰作。威尔逊·凯撒(Wilson Kaiser)认为:“索尔·贝娄的《奥吉·马奇历险记》是一部流浪汉小说,讲述了一位散漫而英俊的年轻人的故事。在他无尽的旅行中,各种机会和大门似乎总为他而开。从芝加哥到墨西哥,从南北美洲到欧洲,奥吉展现出卓越的身体流动性,这种流动性使他能够与途中遇到的富人阶层以及穷困潦倒的波希米亚流浪汉建立联系。”(Kaiser, 2013: 320)不仅青少年,甚至不同种族和社会阶层的成年人,也在美国文学中以弗兰德斯式的流浪为主题进行叙事。这种旅行叙事在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以及理查德·赖特的《土生子》中均有体现。尤其是“垮掉派”作家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成为20世纪美国小说中旅行与流动性叙事的典型代表。“《在路上》的天才之处在于它将新兴的躁动不安与美国经典的道路神话相结合,用这种躁动不安来呈现一系列颠覆性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将向20世纪50年代以城市郊区和大公司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发起挑战。作品中的道路象征着战后美国那种情感奔放、行动自由、不受束缚的精神。”(伯克维奇, 2005: 186)

对美国文学中流动性叙事产生深远影响的另一部经典作品是古罗马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约翰·希尔兹(John Shields)指出,《埃涅阿斯纪》中那位既厌战又勇敢的半人半神英雄,以及特洛伊战争的幸存者,实际上成为美国文学想象中的原型。他在史诗般的旅行中四处漂泊,以完成神圣使命(Shields, 2001: xxxiii)。在神谕的指引下,埃涅阿斯带领家人逃离即将毁灭的特洛伊城,踏上寻找新家园的旅程。在地中海流域,他辗转多地,包括安坦渥斯、德洛斯、布特林特、卡斯特罗、德瑞帕诺、色雷斯、克里特岛等,甚至在迦太基与女王迪多展开一段短暂而浪漫的爱情。然而,为了使命的完成,他不得不忍痛割舍这段爱情,最终抵达拉维尼亚(今意大利地区),建立新的国家秩序。这一史诗性漂泊的主题,是对美国殖民地时期及美国建国初期欧洲移民的深刻映照。那些跨越大西洋抵达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如同埃涅阿斯及其随从,怀揣重建家园的崇高理想,将流动性与使命感紧密结合,为美国文化和文学中的迁徙、漂泊与流动性叙事提供了历史与精神上的范例。

纳撒尼尔·霍桑和赫尔曼·梅尔维尔的小说尤其突出了埃涅阿斯式的漫游精神和使命感。在霍桑的短篇小说《我的亲戚莫里钮斯少校》中,主人公罗宾正是这种典型形象的体现:他毅然离开乡间安逸的家园,独自前往城市创业,并希望借助一位亲戚的支持来实现自己的抱负。然而,为了彻底与自己天真、青春的过去告别,罗宾必须横渡一条河流,这一“摆渡过河”的母题,其主要文学源头可追溯至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在史诗中,为了明确自身的使命和存在的意义,埃涅阿斯必须穿越冥河进入地狱,而这一过程要求向船夫查伦支付贿赂。罗宾亦效仿其史诗前辈,向摆渡的船夫支付费用,从而被带入一座阴暗、充满超自然气息的城市。在这座城市里,他经历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其中包括亲历对亲戚莫里钮斯少校的狂欢式羞辱。通过这一连串事件,罗宾逐渐洞察了莫里钮斯少校所代表

的英国殖民主义本质,并最终拒绝其帮助,选择开辟属于自己的创业之路。这条道路不仅是个人独立的象征,也映射了新兴美国社会寻求独立与自主的精神追求。霍桑通过罗宾的旅程,巧妙地将古典史诗中的史诗性使命感转化为美国文学中探索个体自由与社会认同的叙事模式,展示了流动性叙事在塑造国家文化身份中的潜在作用。

赫尔曼·麦尔维尔的《伊斯雷尔·波特》(*Israel Potter*, 1855)中的同名主人公,更是典型的埃涅阿斯式人物。正如曼纽尔·布朗卡诺(Manuel Broncano)所指出的,“伊斯雷尔追随的是埃涅阿斯的步伐,尽管等待他的是完全不同的命运”(Broncano, 2008: 500)。波特离开他位于伯克西尔县的家乡,投身邦克山战役,参与乔治·华盛顿将军领导的美国独立战争,其初衷是为新生的独立国家奋斗,然后归乡继续田园生活。然而,他伟大的使命感却在一连串意外事件中不断被扰乱。在这漫长而不由自主的漂泊中,波特陆续遇见了诸如本杰明·富兰克林、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美国海军将领约翰·保罗·琼斯等历史人物,他们的出现不仅丰富了波特的人生阅历,也拖延了他归乡的脚步。在伦敦,麦尔维尔将城市描绘成一座类似于但丁《神曲》中地狱的场所,波特在此经历了一段与埃涅阿斯“地狱之行”颇为相似的旅程。对于埃涅阿斯而言,地狱之行是一种获得启示、明确使命的重生经历;然而对于波特而言,这段经历却没有带来再生,而是将他推入赤贫与困顿之中,成为漂泊生活的象征。经过50多年的历险,波特最终得以回到心心念念的故乡,但与埃涅阿斯不同,他未能像史诗英雄那样重建家园。麦尔维尔通过波特的经历,强调了个人奋斗、历史偶然性以及美国独立运动中个体命运的复杂性,使埃涅阿斯式的史诗旅程在美国现实主义语境中被重新诠释:流动性和旅行不仅是探险或英雄主义的象征,也是面对历史变迁与社会现实的生存考验。

4 结语

流动性和旅行,作为人类的宏大行为与观念,虽然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其历史根源却可追溯至古希腊和罗马时期。在神话、史诗和文学作品中,流动性不仅体现为人物的物理迁徙,更成为塑造身份、实现使命、探索世界以及建构文化想象的重要手段。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 2004: 9)认为:“最早的欧洲小说讲的都是一些穿越世界的旅行,而这个世界似乎是无限的。”这种古典传统中的流动性叙事,为后来的欧美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叙事模型和象征意义,使旅行不仅是故事发展的线索,更成为探索个体与社会关系、历史与文化语境的重要途径。在美国文学中,流动性与旅行的主题表现得尤为充分。作为一个“坐在车轮上的国家”,美国文学从殖民时期到现代都深受旅行经验和流动意识的影响。无论是17世纪早期殖民者漂洋过海的定居叙事,18世纪小说中弗兰德斯式的孤儿流浪,还是19世纪马克·吐温、赫尔曼·麦尔维尔和纳撒尼尔·霍桑笔下

的漫游与漂泊,抑或 20 世纪凯鲁亚克、塞林格和索尔·贝娄所描绘的跨洲漂泊与心理流动,美国文学始终与空间流动、社会迁徙以及身份探索紧密相连。正如詹尼斯·斯道特(Janis P. Stout)所言,“美国文学一直就是走在旅途中的、运动中的文学”(Stout, 1983:3),旅行不仅塑造了文学的形式与结构,也成为建构美国文化认同和历史经验的核心叙事动力。因此,追溯古希腊、罗马神话及文学中的流动性叙事,不仅有助于理解欧美文学的源头和演变逻辑,更揭示了流动性作为叙事策略和文化符号的持久价值。从史诗到小说,从英雄旅程到个人漂泊,流动性在文学中不断被重塑、延展,成为连接古典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学创新的关键桥梁。

参考文献:

- 伯克维奇·萨克文. 2005. 剑桥美国文学史(卷七)[M]. 蔡坚,等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 米兰·昆德拉. 2004. 小说的艺术[M]. 董强,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严绍璁. 2003. “文化语境”与“变异体”以及文学的发生学[J]. 中国比较文学(3):1-14.
- Arciszewski, Tomasz. 2016. *Inventive Engineering: Knowledge and Skills for Creative Engineering* [M]. Boca Baton, Florida: CPC Press.
- Arnold, Matthew. 1869/1960. Culture and Anarchy [G] //Super, R. H. *Complete Prose Works of Matthew Arnold*. Vol. 5,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Broncano, Manuel. 2008. Strategies of Textual Subversion in Herman Melville's "Israel Potter" [J]. *Amerikastudien/American Studies* (4): 491-505.
- Constantine, David. 1984. *Early Greek Travelers and the Hellenic Ideal*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vis, Thadious M. 2011. *Southscapes: Geographies of Race, Religion, & Literature* [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 Ewers, Chris. 2018. *Mobility in the English Novel from Defoe to Austen* [M]. Woodbridge and Rochester: Boydell Press.
- Forder, Tim. 2014. *Walfman Owner's Manual* [M]. White Bear Lake, MN: Mclange Books, LLC.
- Greenwood, Emily. ed. Jennifer Speake. 2013. "Odyssey," *Literature of Travel and Exploration: An Encyclopedia*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880-882.
- Herlihy, David. 1973. Three Patterns of Social Mobility in Medieval History [J].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4): 623-647.
- Jensen, Mette. 2006. Environment, Mobility,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Time: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Transpot Flows in Modern Life [G] //Gert Spaargaren, A. P. J. Mol and Frederick H. Buttel. *Governing Environmental Flows: Global Challenges to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327-350.
- Kaiser, Wilson. 2013. The Einhorn Effect in Saul Bellow's Adventures of Augie March [J]. *The Explicator* (4): 320-24.
- Konstantinou, Ariadne. 2018. *Female Mobility and Gendered Space in Ancient Greek Myth* [M]. New York and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 Laderman, David. 2010. *Driving Visions: Exploring the Road Movie* [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Mewshaw, Michael. 2025. Travel, Travel Writing and the Literature of Travel [J]. *South Central Review* (2): 2-10.

- Rebhorn, Wayne A. 2013. Introduction[G]//Giovanni Boccaccio. *The Decameron*. trans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Wayne A. Rebhorn,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
- Schlesier, Renate and Ulrike Zellmann. 2004. *Mobility and Travel in the Mediterranean from Antiquity to the Middle Ages*[M]. New Bra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Shields, John C. 2001. *The American Aeneas: Class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Self* [M].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
- Simmel, Georg. 1997. Simmel on Culture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Smelser, Neil J. 2009. *The Odyssey Experience: Physical,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Spiritual Journeys*[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tout, Janis P. 1983. *The Journey Narrative in American Literature: Patterns and Departures* [M].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 Urry, John. 2007. *Mobilitie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Wright, Sarah B. 2020. *Mobility and Identity in Chaucer's Canterbury Tales*[M]. Woodbridge, UK: D. S. Brewer.

Mobility in the Ancient Greek-Roman Mythology and Literature and Its Genetic Influence on the Mobility Narrative in European-American Literature

TIAN Junwu

Abstract: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Western scholarship proposed the notions of the “spatial turn”, the “mobility turn” and the “travel turn”, which are in fact closely interconnected, all pointing to the displacement of bodies, minds, and objects within geographical and social spaces. Among them, “mobility” functions as the broader concept, encompassing “travel” while highlighting migrations and transformations that cross territorial and cultural boundaries. Tracing their origins, one finds that ancient Greek mythology and literature offer the earliest narrative paradigms. Homer’s *Odyssey*, centering on themes of heroic wandering, homecoming, and self-recognition, lays foundation for mobility narratives in Western literature, while Virgil’s *Aeneid* further establishes, through inheritance and transformation, the narrative patterns of exile and nation-building. These classical texts not only shape the traditions of travel and mobility writing in European literature—exemplified by Dante’s *Divine Comedy*, Boccaccio’s *Decameron*, Bunyan’s *The Pilgrim’s Progress*, and Defoe’s *Robinson Crusoe*—but also profoundly influence the emergence of American literature. The motifs of heroic wandering and the quest for home in American writing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Aeneid*, while the themes of orphaned drifting and fractured identity derive from Defoe’s *Moll Flanders*. Thus, the mobility narratives of ancient Greek myth and literature constitute not only the fountainhead of the Western literary tradition but also the archetypal model for the representations of travel and mobility in both European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Key words: mobility; travel; Greek-Roman mythology and literature; European-American literature; Literary Genesis

责任编辑:冯革